

从乡村到都市：融入与隔离^{*}

——关于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

郭星华 储卉娟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引入社会距离 (social distance) 的概念,运用问卷调查的结果,对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正在逐渐增大,他们缺乏主动介入城市生活的积极性,并且感觉与城市生活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关系日趋隔离,社会距离的增大使得民工群体自愿选择结成自己的社群网络,并以此与城市生活产生隔离。本文对社会距离增大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新一代民工的身份认同变化、城市居民的刻板印象以及传统网络的存在是社会距离增大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社会距离 新生代民工 自我隔离

改革开放近 30 年来,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这么说,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城乡社会流动的频繁构成了我国农村社会发生的三大重要社会变化”,而毋庸讳言的是,除了对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之外,这三大变化联合作用的一个很现实的结果就是民工问题。学界对民工潮的形成有不同的看法,乐观的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有了新的渠道,悲观的看法是城市由此而潜伏着不稳定的因素。而现实将走向何方?“实际上主要应当看这部分人能否最终融入城市生活,并在城市中确立合适的社会地位”。

目前对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研究很多,但总结一下,大抵都基于以下两种不同的判断:(1)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民工正在一步一步地融入城市,这表现在季节性打工的比例正

在降低,对家乡的依恋正在减少,相反,农民倾向于在城市中寻求更长期的发展。(2)民工与城市生活存在深刻的隔阂,它们虽然在城市生活,但是仍然依赖传统的社会网络,而这种依赖,在大批农民移居城市并以同乡群体为皈依所建立的,称之为都市里“村庄”——移民飞地 (Migrant Enclave) 的现象上得到充分的显示。这两类研究对于民工融入的判断完全不同,但都有相应的事实支持,也都有扎实的分析,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呢?

本文试图引入社会距离 (social distance) 的概念,运用问卷调查的结果,对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正在逐渐增大,他们缺乏主动介入城市生活的积极性,并且感觉与城市生活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关系日趋隔

* 本研究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重点项目 (01JAB0840005) 阶段性成果。

离,社会距离的增大使得民工群体自愿选择结成自己的社群网络,并以此与城市生活产生隔离。本文对社会距离增大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新一代民工的身份认同变化、城市居民的刻板印象以及传统网络的存在是社会距离增大的重要原因。

社会距离:客观性还是主观性?

针对民工的融入问题,目前已有的分析基本都集中于对客观现象的分析,并据此来判断民工对城市生活的融入程度。具体来说可以归为两类:第一类以生活空间的城市化来衡量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标准;第二类则将标准定位于社会网络,观察民工在城市中是否依然依赖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如果是,则就此认为融入程度仍然不强,至于民工的主观动机和主观态度,则基本被研究者排除在研究视域之外。但是融入作为一个双向性的概念,除了包括融入的表现之外,还应当包括融入的愿望。这就如同我们观察两个人的关系时,除了是否同进同出,是否接触频繁之外,当然还会去考察是否存在心理上的互动,是否存在心灵上的契合,没有对后者的肯定回答,最多只能得出貌合神离的结论。

那么,民工与城市生活之间是否也存在这种貌合神离的状况呢?如果能得出肯定的结论,或许我们能够对现在关于民工融入讨论中出现的矛盾给出一些可能的解答。基于这样的研究目的,本文引进社会距离的概念,希望通过对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测量,研究民工对城市生活的主观融入意愿,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检验民工对城市生活的实际融入程度。

关于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的概念,在理论上向来有主观性与客观性的争论。当塔尔德(Gabriel Tarde)在他的《模仿法则》(Law of Imitation)一书中第一次使用社会距离概念的时候,他是用这个概念来表征阶级差异,因此,社会距离是一个客观性的概念,强调的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客观差异。齐美尔(Georg Simmel)在论著中使用这一概念,却将它赋予了主观性的色彩。帕克(Robert E. Park)直接继承齐美尔的用法,并将这一概念

介绍进入美国的社会学界,他指出,社会距离“描述的是一种心理状态,由于这种状态使得我们自觉地意识到自身与我们所不能完全理解的群体之间的区别和隔离”。这里,社会距离已经变成了一个主观性的概念,强调心理上的区别和隔离状态。而最终使得这一概念成为社会学中普遍适用概念的则是博卡德斯(Emory S. Bogardus)。通过一系列的问题,博卡德斯将社会距离从概念变成了具体的测量刻度,通过考察行动主体是否愿意与其他人或者其他社会群体交往,来测量社会成员对于他们之间或者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成员之间距离的感觉。博卡德斯的社会距离刻度影响很大,很多研究种族、性别的学者也都沿用这一概念进行分析,虽然在具体的刻度上有所改进,在概念上却并无重大修改。后来也有学者,如拉美尔(Rummel)对博卡德斯社会距离的心理性提出质疑,认为社会距离应当回归塔尔德时代的客观性,认为“社会距离是最形式化也是最普遍化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则是社会交往过程的结果;社会距离因此可以被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发生关联时所产生的情境(condition)。”

本文仍然坚持在博卡德斯的意义上使用社会距离这个概念。第一、最初的意义不等于是最丰富的意义。如果要坚持跟前人对话,我们应该选择被大多数相关领域接受的概念,除非有对概念根本性的修正,否则对话就无从说起。第二,拉美尔的客观社会距离包含了太多的信息,他认为:“社会距离是一个包含了多层含义的术语,这些含义包括人与人之间各方面的社会差别和相似点,以及在社会空间上的社会位置。”^⑩但是,社会差别和相似点何其繁多,放在一个概念里加以解释,概念分析的针对性和相应的对经验事实的穿透性都会随之降低。第三,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人的主观心态对于群体之间的亲密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客观社会距离却将之排除出去。当然从理论上说,还有一种概念重新建构的可能性,就是将主客观一并纳入社会距离的范畴。这种做法从表面上看拓宽了概念的外延,似乎能够在最大限度内与前人对话,但是却存在一个分析上的困境。如果两个群体在主观上相互排斥,而客观上却相

互融合,我们该如何断定社会距离的变化?要将问题讲清楚,势必还是要把社会距离概念拆成主客观两个子概念个别讨论,既然这样,之前的概念合并就失去了现实的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决定沿用博卡德斯主观性社会距离的概念,将之定义为:存在于行动者心理空间中的,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心理距离。A对B的社会距离越大,意味着A在实际生活中与B的互动行为越少,融入B的生活空间的愿望越弱。

比照人与人之间观感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将主观意义上的社会距离分解成三个层面:向往程度、排斥预期和整体感觉。向往程度是指民工心理上渴望进入城市居民群体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等同于心理认同程度;排斥预期是指民工所预期的,当他与城市居民发生社会交往时可能受到的歧视与排斥程度,也就相当于费孝通所说的“我看人看我”;整体感觉则是指民工对于自身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做出的概括性判断。向往程度和排斥预期结合起来,描述的是民工主观状态中自身与城市居民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再设立整体感觉这个层次,是因为人们的主观印象往往不仅仅是理性分析的结果,而同时也受到社会一般观念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会成为社会交往意愿的潜在背景。我,我看人看我,我看人,这三个主观层次结合在一起,基本上可以勾画出社会距离的基本状况,因此,这三个层面将成为我们研究民工社会距离的基本分析框架。

矛盾的心理:向往与排斥

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关于民工的研究基本停留于从一个静态和同质的角度来认识农村流动人口现象,而缺乏对农村流动人口自身变化的把握。王春光针对这一问题,对民工本身发生的代际分化做了很精彩的分析,提出了新生代民工的概念,基本划分标准是:年龄普遍较小,大多在25岁以下,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成长和受教育于80年代,基本上于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受教育水平比其他农村流动人口高;他们参加务农的时间和机会少,有许多人根本没有务

农经历,等等。在一系列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王文指出,新生代民工与上一代相比,不仅在流动动机上存在很大的差别,而且在许多社会特征上很不相同^⑫。考虑到民工内部的这一分化对于社会距离的测量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使得研究更加具有针对性,我们将研究对象限定为:新生代民工与上一代民工对城市居民心理距离的比较,并将25岁以下者定义为新生代,25岁以上(不含25岁)定义为上一代。

在对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方面,新一代民工是否有其自身的特点,是日趋融合还是愈加隔离?我们运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2年所做关于“海淀区流动人口生活方式研究”的调查数据^⑬,针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由于样本的局限性(只是在北京市一个区内进行的抽样),这次调查和研究结论的普遍适用性必然受到限制,但是,特殊性与普适性的矛盾在社会学中总是存在的,只要我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自觉控制研究的发散性,这并不影响研究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首先,我们的调查表明,从民工对城市居民生活的向往程度来看,新一代民工表现出更加冷淡的倾向。当被问及是否经常与城市居民一起娱乐、日常交往、共同居住以及谈恋爱时,与上一代民工相比,新一代的肯定性回答比例都有所下降。参见表1。由于娱乐、日常交往、共同居住以及谈恋爱都是可以由个人自由控制介入程度的事项,不存在必须介入的情况,新一代民工在这些交往上的冷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表明他们对于城市居民生活主动介入程度的减弱。

表1

问 题	肯定性回答的比例	
	上一代	新一代
1. 是否经常与北京同事一起娱乐?	28.1%	20.0%
2. 是否经常与社区当地居民来往?	23.4%	14.0%
3. 内心是否愿意与房东一起住?	49.6%	45.8%
4. 未婚者是否考虑过跟北京市民谈恋爱?	65.2%	28.4%

(各项问题回答均有显著差异, $P < 0.05$)

而从排斥预期来看,新一代的民工却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反应。与老一代相比,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城市居民对他们有着根深蒂固的歧视与排斥。尤其当被问到是否觉得“和北京市民相处时,自己没什么不自在,而他们感到不自在”时,上一代的民工当中只有 5.5% 的人有这种感觉,而新一代中这个比例激增到 17.5%。关于这一点,参见表 2。

表 2

问 题	肯定性回答的比例	
	上一代	新一代
1. 所在社区的居民是否欢迎你们在这里居住?	54.5 %	48.2 %
2. 您认为,城市人从内心来讲愿不愿意和外地人做邻居?	36.4 %	24.4 %
3. 和北京市民相处时,自己没什么不自在,而他们感到不自在。您是否有这种感觉?	5.5 %	17.5 %

(各项问题回答均有显著差异, $P < 0.05$)

就民工对于城市居民的整体感觉来说,相对而言,新一代民工也更多地觉得与城市居民关系疏远,互相难以了解,很少来往,并且存在明显的心理隔阂。具体参见表 3。

表 3

问 题	肯定性回答的比例	
	上一代	新一代
1. 你和单位里北京人的关系是否亲密?	43.9 %	27.9 %
2. 您认为您与您认识的城市人是否了解、经常来往?	25.2 %	17.4 %
3. 您是否觉得您与市民之间有一种心理隔阂?	54 %	57 %

(各项问题回答均有显著差异, $P < 0.05$)

通过调查分析,综合向往程度、排斥预期与整体感觉三个层次,我们发现,新一代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要大于上一代,而不是像某些研究所指出的那样,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不断缩小。与上一代民工相比,新一代民工更加不愿意主动介入城市生活,他们中更多的人拒绝与城市居民共同分享私人空间(娱乐或者居住)与情感交流(比如谈恋爱),对于城市居民对自身的排斥有更强烈的感触和预期,对城市居民抱有更多的偏

见^⑭,并且形成了对于城市居民疏远隔膜的整体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下面,我们将结合社会现实与这次调查中的一些数据,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

首先,新生代民工进入城市的期待与上一代民工有所不同,从而导致心理更容易受挫。近期很多关于民工输出的研究都指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经济型转到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状态或者生活型。所谓经济型,是指外出务工经商的目的和动机纯粹是为了赚钱,以贴补家用;而生活型指外出务工经商主要是为了改变生活状况和追求城市生活或现代化生活方式,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的状况就是兼具经济型动机和生活型动机的特点,或者同等看待它们的作用、意义和重要性。王春光在关于新生代民工的调查中指出,20 世纪 90 年代农村流动人口外出的初始目的已经呈多样化态势^⑮。根据文军的研究,现在只有 32.67% 的人认为由于是单纯的经济原因促使他们外出务工经商,而更多的人认为他们选择外出务工经商是出于其他原因,如“不喜欢务农”(12.5%)、“家乡太穷,不愿过那样的生活”(11.09%)、“一直在念书,不懂农活”(13.86%)、“羡慕城市生活”(9.5%)等等^⑯。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到结论,20 世纪 90 年代农村人选择外出务工经商,在考虑赚钱的同时,更多是出于改变生活状态和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目的,他们外出的动机具有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的特点。

这种动机的变化直接导致的是新生代民工对于自身身份认同的变化。在上一代民工那里,他们在城市的地位究竟是农民还是工人,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他们本来就只是为了赚钱才来到城市,而身份是什么,与赚钱关系并不大;但新生代民工,却是抱着发展自身的目的来到城市,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进入城市打工离开穷苦的农村,变成真正的城里人,打开新的生活局面^⑰。这种心态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开始不那么在意城乡户籍制度所赋予他们的农民身份,而趋向于看重社会对他们的农民身份的认定,因此自觉地将生活、价值观等非制度

性因素作为农民与非农民的界线;第二,正是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把自己看成是农民,而是一个有可能融入城市的潜在城里人,因此他们开始更多地注重自己跟城里人在生活习惯、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而不仅仅是社会地位、收入

或者职业上的不同。通过我们的调查可以看到,当问到与城市人的差别时,收入在上一代民工那里是仅次于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但在新生代民工那里,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以及生活习惯却跃居收入之前,变得异常关键。具体参见表4。

表4

代际	与城市市民差别的心理排序						
	上一代	社会地位 (26.8%)	收入 (17.9%)	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16.3%)	生活习惯 (12.2%)	教育程度 (7.3%)	职业 (11.4%)
新一代	社会地位 (23.1%)	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21.4%)	生活习惯 (19.7%)	收入 (14.5%)	教育程度 (10.3%)	职业 (7.7%)	其他 (3.4%)

由于这种期待的转变,使得新生代的民工比上一代人更加敏感地看待城里人对他们的态度,同样的待遇,就有可能在两代民工的心理上造成非常不同的反应(见表5):

表5

问 题	肯定性回答的比例	
	上一代	新一代
1.最近三个月是否受过北京人的欺负?	16.4%	23%
2.最近三个月内,你在北京是否受到过工商、税务、警察等管理人员的罚款?	37%	13%
3.最近三个月内,你在北京是否受到过工商、税务、警察等管理人员的查抄?	44.9%	32%

当被笼统地问到是否曾被北京人欺负的时候,新生代民工的反应比上一代民工要强烈得多。但是当这个问题具体到是否受过罚款、是否受到查抄的时候,数据显示其实新生代民工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其实是更小的。之所以会如此,正是因为新生代民工对城市居民看法的敏感反应,导致了他们更加容易自觉地发现自身在城市居民心目中的农民身份,从而在心理上与城市居民产生隔阂。

其次,新生代必须面对城市中已经形成的关于民工的歧视印象。自从民工潮成为都市的重要社会现象以来,毋庸讳言的是,它的确给城市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大量的民工涌入城市,对城

市的物质供应、交通运输、社会治安、环境卫生等各个方面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损害了城市居民的生存环境,导致市民对民工的抱怨、厌恶和歧视;另一方面,长期的城乡二元对立体制造成了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深刻的隔阂,当农民留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时,城市居民可能还对他们抱有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想像,或者对他们穷苦的生活境遇流露一丝同情。但是,当他们来到城市谋生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由于他们在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方面表现出与城市生活的异质性,很容易在人们的想像中转化为城市居民难以接受的形象——肮脏、粗鲁、野蛮、不守规则,并且危险。项飏把这种心态的形成比做道格拉斯所指出的“秩序决定洁污定义”,是很有道理的。于是,当新生代的民工进入城市以后,他就不再可能以个人身份,而是必须作为受歧视群体的一分子开始与城市居民的日常交往,他们必须要面对这些已经形成、而实际上与他们并没有直接关系的歧视和排斥。正像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只能占据这样一个先定的受歧视位置,他们所掌控的交际资源因此受到极大的限制,并因此从一开始就只能扮演一个被歧视被拒绝的社会角色^⑮。戈夫曼曾经指出,角色总是在不断扮演自己的过程中获得再生产^⑯。新生代的受挫感于是在每一个社会交往的细节中被不断强化,相应地也产生了对城市居民更为强烈的抵触心理。

最后,新生代民工在城市中已经拥有一定的传统社会资源,足以对抗其城市社会资源之不足^{②0}。随着对民工的研究方向从“劳动力流动”向“社会流动”的转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民工对传统社会资源的挖掘和依赖。传统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的社会资源网络为什么在现代城市中仍然能够生存并蓬勃发展,金耀基认为,民工并未完成社会心理的现代转型,因此坚持乡土心理认同,进而依赖传统的社会资源网络^{②1};陆绯云则将这种依赖归因于传统关系网络提供人际信任或者提升安全感的社会功能^{②2};项飏在对浙江村进行了6年多的调查研究后,认为这种依赖是民工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理性选择的结果^{②3}。无论成因而如何,在新生代民工进入城市的时候,也就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工已经在城市里建立起了规模庞大的传统社会资源,大批农民以同乡群体为皈依所建立的大批都市里的“村庄”就是非常充分的显示,在我们做调查的海淀区,就有著名的安徽村和新疆村。这些村落在陌生人的现代社会中搭建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②4},为村落内部的人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资源,这些资源包括谋生的路子,甚至能够实现社区认同的共同体情感。

于是,当新生代民工怀抱着进入城市的良好愿望进入城市的时候,他们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固定在了一个受歧视的社会位置上,并被某种意识形态塑造为城市里的“危险分子”^{②5}。他们无法进入他们向往的城市生活圈,但由于城市生活方式的感染,他们原有的乡土认同也已经在渐渐消退^{②6},如何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如何确定自己的未来?王春光在研究中表达了他对于新生代民工漂泊倾向的担忧,但是他忽视了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新生代民工将会主动退避而进入城市里的传统社会,积极寻求传统社会资源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项飏所指出的,传统社会网络在现代城市的生存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新生代民工的经济行为不再是被动嵌入在社会关系中,而是依靠着社会关系而不断主动“展开”,并进而影响着社会关系的构造方向^{②7}。

艰难的选择:融入还是隔离?

通过引入社会距离的概念,加入民工心理层面的分析,我们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如何解释两类研究对于民工融入完全不同的判断,就会发现问题变得很清晰:所谓的民工正在一步一步融入城市的证据,也就是季节性打工的比例降低,民工倾向于在城市中寻求更长期的发展,其实不过是新生代民工在流动动因上的变化表现而已,单独并无法证明民工融入现代城市程度的加强;而都市里的“村庄”则的确反映了目前民工与城市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城市里谋生,却在村庄里生活,无法与真正的城市生活融为一体。

但引入社会距离的分析意义还不限于此。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了都市村庄的另一层功能:给新生代的民工提供社区认同和未来的归属。当新生代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日益扩大,融入日益困难的时候,都市村庄就不仅仅像大多数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可以“弥补正式社会组织机制不完善所造成的同乡权益受损或同乡群体与所处社会环境的失调,帮助同乡新移民能够尽快嵌入所处的社会”,它也可以帮助新移民躲避所处的社会,既躲避伤害,也躲避改造的力量;它不仅仅“像一座桥梁把家乡同外面的世界联系起来”,更像一个新的世界,通过它“跨越边界”的特殊地位,将新移民与家乡与城市隔绝,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发展自己的逻辑、社会图景和秩序^{②8}。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正在进行艰难选择的社会群体,他们面临的甚至不是一个或者融入或者隔离的自由选择,而是一个悖论:为了融入被人们视为更加现代化更加美好的城市生活,他们在心理上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固执地在陌生的城市里寻找新的可能。但是他们的理性选择和社会行动^{②9}的结果,却是让自己在城市里陷入另一个隔离的世界。与制度性的非自愿性隔离不同的是,这样的隔离是新生代民工群体综合主客观各方面的因素,进行自主选择并且不断实践的结果,是梯姆斯所说的“自愿性隔离”^{③0},但是结果却蕴含着区域性的社区唐人街化,或者说贫民窟

化的危险。与此相联系,更加悖谬的是,一直被学术界诟病、被农民痛恨的城乡二元化结构,因此有可能在城市中得到重现并固化。

正如本文开头所言,现实将走向何方?“实际上主要应当看这部分人能否最终融入城市生活,并在城市中确立合适的社会地位”。虽然很多研究已经表明,民工在面对既有的制度、文化、资源时,如何理性地规划自己的行为,争取发展的机会,以节约流动成本和交易成本,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进而甚至对整个社会结构发生影响。但是我们的研究却同时表明,这种理性化的行动只会造成社会结构的进一步恶化,或者像孙立平所指出的不断地“断裂”。那么,我们就必须将目光再重新拉回宏观制度层面,考虑如何通过社会制度的变革,来改造民工理性选择的宏观背景以及行动结果。

首先,实现城乡居民身份平等化,也就是取消身份上的差别,给农民这个群体以真正平等的待遇。制度上的平等,可以成为民工获取心理平等感觉的重要权力资源。而这一点,对于推动民工主动介入城市生活,以及减小受排斥的预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次,建立平等的市民保障体制。民工和城市工人完全不同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措施,正在人为地制造三六九等的事实和心理定位。在这种制度下,即便没有城市人故意的歧视目光,民工也会在制度的嘲笑声中体会到社会对他们的排斥。

最后,努力建构平等的市场准入机制。目前实行的歧视性市场机制,造就了所谓的民工行业,民工在建筑、家政等领域内大量聚集,积累起丰富却僵化的社会资源网络,造成工作和生活两方面与城市生活、城市居民的隔离。要打破现在的聚集状况,打破内外群体的交流障碍,必须建立平等自由的市场准入机制,形成民工和城市居民共同竞争,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相互依赖,相互交流的局面。

王春光:《社会流动和社会重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也产生了大批的农村

剩余劳动力;乡镇企业的技术化含量不断提高,迫使剩余劳动力另找出路;而城乡社会流动在实际上放开,则引导大量的农民涌向城市,成为制度身份不确定的民工。类似的论述可参见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这样的研究结果可参见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三联书店2000年版;王春光《社会流动和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陆绎云《同乡关系网络与中国大陆的“民工潮”》,载朱燕华、张维安编《经济与社会——两岸三地社会文化的分析》,生智文化事业2001年版。

项飙等人对于浙江村的研究,虽然强调对于实践者意愿的研究,甚至强调这种主体选择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和塑造作用,但他们的研究基本上仍然建立在实践者如何参与城市生活这一客观行为的基础上,而基本没有涉及到对这些实践者主观融入程度的测量。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些研究也已经开始使用社会距离的概念,但基本都沿用某一派的观点,并没有对这个概念本身的复杂性进行分析。

见 Coser: On Park, 载于 Dear Sociologists' Index, 电子版。

见艾尔·巴比《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第七章,华夏出版社,第166~182页。

可参见 Abrahamson, 1983; Adams and Schvaneveldt, 1985; Bailey, 1982; Baker, 1994; Miller, 1977; Williamson, et al., 1982.

⑪见 R.J. Rummel: Understanding conflict and war, 电子版。

⑫⑬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问题》,《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⑭本文根据的材料是笔者参加的课题组于2003年在北京市海淀区所做的问卷调查,有效样本量257,其中男性占63.8%,女性占35.2%;平均年龄28.6岁,25岁以上占51.2%,25岁以下占48.8%;未婚的占52.3%;受教育程度初中的最多,占52%,小学的占12.5%,高中以上的占29.3%,文盲占6.2%。其中受教育程度与年龄的相关度基本符合王春光关于新生代与上一代划分的其他标准,这一方面说明了借用这一概念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间接验证了王春光关于代际划分标准的研究。

⑮本文在非贬义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强调的是先入之见的意识。

⑯文军:《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二十一世纪》2001年2月号。

⑰见王春光《社会学家与打工妹的对话——民工“新生代”走向何方》,《中国青年报》2002年4月14日。

⑱参见[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⑲参见[美]戈夫曼:《日常接触》,徐江敏等译,华夏出版社1991

年版。

- ⑳当然这并不是说上一代的民工没有,这一点分析是建立在前两点分析的基础上,强调的是对新生代民工心理成因的分析。正是因为新生代民工的融入心理受挫,并且遭受到更强大和牢固的歧视,替代性的社会资源这一点才变得异常关键。
- ㉑见金耀基《关系和网络的建构——一个社会学的诠释》,刊于《中国社会与文化》1992年版。
- ㉒见陆绯云《同乡关系网络与中国大陆的“民工潮”》。
- ㉓见项飏《跨越边界的社区》。
- ㉔用项飏的话说,一种跨越边界的社区,但他建构这个概念目的主要在于描述这种社区对于社会构造的意义,在该社区与社区内行动者的关系上,与传统的熟人社会的差别并不大,因此,本文沿用了这个更加古老但也更加“安全”的概念。
- ㉕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各种关于提高民工素质的文章和宣传,包括前一段时间教育民工要不偷盗的素质歌。
- ㉖具体论证可以参见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问题》。
- ㉗项飏:《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引论部分,三联书店2000年版。
- ㉘项飏在他对浙江村的分析最后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如他发现“浙江村”里第一批在北京受教育的青少年,出现了回归的趋势,并进而在这个社区里,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化模式。他将此归结为村里人不同于北京人的社会图景和秩序的想像,但这种想像如何而来?何以这种想像竟然如此顽固,无法为社区外的想像所更改,我们认为,这仍然是由于对社区存在认同和归属感所致,而这种认同和归属感正是社区内与社区外社会距离过大以致无法融合的背景下,社区内成员理性选择的结果。
- ㉙很多研究都倾向于将农民处理成非理性行动的主体,并相应地将农民的境遇改善与农民自身素质提高联系在一起。但是,已经有研究开始注意到农民行动的理性化特征,并尝试从结构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农民问题,这方面的努力包括:詹姆斯·斯科特《东南亚农民的道义经济学》,项飏《跨越边界的社区》,欧阳剑觅、王列军《社区的历程》(未刊稿)等。本文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处理民工的行动问题。
- ㉚梯姆斯认为,个体的认同与他的互动对象密切相关,个体的公共认同以及他的阶级归属感,是由与他经常互动的群体的

特性决定的。这样,有共同需要的群体,面临共同的问题,群体成员生活在一起就能更好地满足大家的需要、处理共同的问题,并逐渐形成群体亚文化圈。参见 Timms, D. W. G (1971). *The urban mosaic: Towards a theory of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参考文献

1. 朱燕华、张维安:《经济与社会——两岸三地社会文化的分析》,生智文化事业2001年版。
2. 蔡志海:《制度变迁中民工的生存状态及其未来命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3.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问题》,《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1期。
4. [美]艾尔·巴比:《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5.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载《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6. 项飏:《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三联书店2000年版。
7. 王春光:《社会流动和社会重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 文军:《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二十一世纪》2001年2月。
9. 李强:《当前我国城市化和流动人口的几个理论问题》,《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0. 孙立平:《断裂》,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1. 陆益龙:《中国户籍制度》,商务出版社2003年版。
12. [美]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3. 郭星华:《社群隔离与测量》,《人大复印资料》2000年第6期。
14. Timms, D. W. G, *The urban mosaic: Towards a theory of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作者简介:郭星华,1957年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储卉娟,女,198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陈如勇)